

# 新时期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置及历史贡献

朱家梅，叶新璐<sup>①</sup>

**摘要：**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党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置的一种特殊组织机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党的干部结构青黄不接、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设置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广泛的资政权能和明确的过渡性质等特征。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实现干部新老交替、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巩固并加强党的领导和党中央权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及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独特历史贡献。

**关键词：**新时期；中央顾问委员会；党的领导；制度；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23)06-0107-09

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当时党的干部队伍严重老化、青黄不接等突出问题，党的十二大创造性地设置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这一特殊组织机构。在存续的十年间，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其独特的组织制度优势在整顿党风党纪、培养年轻干部、资政建言等方面开展了大量重要工作，为推动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强化党的领导和党中央权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及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作出了历史贡献。创设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制度是党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干部新老交替和党的建设问题的成功范例，其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设置的缘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在推进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针对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干部离退休制度建设等突出问题，党的十二大创造性地设置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其目的是“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sup>①</sup>，以推动上述问题的有效解决。

### （一）有利于解决党的干部队伍青黄不接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大量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开始迈向正轨。随着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恢复，干部结构逐年老化和臃肿问题开始显现。从1977年到1980年，全国省级党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上升到61.4岁，60岁以上占比65.6%，41~50岁的领导干部仅占7.86%<sup>②</sup>。全国县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五十多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的头发都白了”。<sup>③</sup>干部结构问题逐渐影响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sup>①</sup>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L25）

作者简介：朱家梅，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新璐，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sup>②</sup>《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9页。

<sup>③</sup>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236页。

<sup>④</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影响改革开放的推进速度和质量。在领导岗位上，“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sup>①</sup>，党的组织缺乏应有活力。邓小平对此非常忧虑：“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sup>②</sup>因此，建立一支年富力强的组织干部队伍，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面对日益严峻的干部结构问题，必须加速推动干部队伍有序新老交替，“成千上万”<sup>③</sup>地发现、提拔和培养符合“四化”要求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sup>④</sup>但是，在快速提拔年轻干部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和困难，这些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sup>⑤</sup>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科学完善的干部选任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党内不少同志主张干部培养“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sup>⑥</sup>，以此避免提拔那些能力不够、经验不足的干部，特别是避免“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进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产生严重后果。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为解决上述障碍和困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案。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置，充分考虑了党的干部队伍老化、老干部仍是骨干以及年轻干部储备不足等实际情况，有利于在不削弱干部队伍和党的领导能力前提下充分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帮助以过渡形式稳妥推进干部新老交替进程，以推动干部队伍年轻化。

## （二）有利于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制度在治党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其中“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⑦</sup>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新时期巩固党的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积累了一些严重问题。一是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破坏。“文革”期间，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民主决策等优良传统没有很好坚持下来，个人凌驾于组织、一言堂、个人崇拜、脱离群众等家长制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逐步发展。二是管理体制僵化。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普遍存在。三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未有效解决。干部队伍臃肿、干部能力无法充分满足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四是法律制度、纪律检查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还不完备。干部队伍中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和违法乱纪问题不时滋长，“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sup>⑧</sup>因此，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积极推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sup>⑨</sup>

中央顾问委员会及老干部退居二线制度的设置，正是为了妥善解决制度改革问题而采取的重大决策。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确保推进过程的稳健和安全，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组织制度的改革尤其如此。实践证明，制度革新一旦过于刚性、强行推进，极易导致社会混乱。创设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制度，在彰显中国共产党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决心的同时，可以更为稳健地推动制度改革和制度衔接，以符合中国实际的举措和力度“使得过渡比较顺利”，<sup>⑩</sup>从而确保制度改革过程中巩固党的领导。

①《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③《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2页。

④《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4页。

⑤《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⑦《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⑩《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

### （三）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是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sup>①</sup> 因此，为了在新时期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态，必须要维护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遭到了严重破坏。各种政治运动和派系斗争此起彼伏，经济社会发展几近停滞。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国家安定和社会团结成为了党内外共识。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并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结束了长期的社会混乱状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各种影响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在改革领域，体制机制的调整催生了许多不同意见和新的摩擦。在社会领域，社会发展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使人们出现了差异化诉求，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和误解不时产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不断出现，对全社会思想的凝聚产生了消极影响。总之，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任务依然繁重。

针对上述问题，老干部能够发挥特殊作用。因为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威望高，社会影响力大，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敬重。作为党的老干部和老领导，老同志讲话有分量，能服众。因此通过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一方面有利于延长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生命，使退居二线的老同志能够以顾问身份继续开展沟通交流等社会服务工作，另一方面有利于持续发挥老干部的政治威望和治党治国经验，协助党中央妥善化解党内外矛盾，增进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在统一改革思想、凝聚发展共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推动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和巩固。

## 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独特优势

不同于党的一般组织，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当时的改革需要而设置的一种特殊组织机构，它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制度优势。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政治地位、资政权能和过渡性质三个方面。

###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

一项制度能否充分发挥效用，与其是否具备高度的制度权威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妥善解决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邓小平的倡议下酝酿成立。作为中央的政治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致，均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时，为了中顾委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邓小平和陈云作为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相继担任中顾委主任，这就使得中顾委具备了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普遍具有深厚的政治资历和政治威望。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sup>②</sup> 这意味着，深厚的政治资历和崇高的政治威望是当选中顾委委员的基本条件。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在党的十二大新当选的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有74人，全部委员都是正部级以上干部，大多数在各地、各部门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sup>③</sup> 同时，出于平稳过渡的考虑，有20多位中顾委委员仍然身处一线领导岗位，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还留在党和国家的中枢领导岗位上。这一安排客观上保证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和领导权威。

作为党中央政治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央顾问委员会与党的中央委员会之间保持着紧密的

<sup>①</sup>《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sup>②</sup>《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sup>③</sup>黎虹《回忆薄老在中顾委的十年》，《党史文汇》2008年第2期。

政治联系。根据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在组织关系上，“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而它的副主任甚至是常务委员，在必要时都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其政治地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sup>①</sup>。同时，绝大多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原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党中央的老战士和亲密同事，按照老干部退居二线后“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并注意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sup>②</sup>的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阅读文件、参加会议等方面拥有与过去基本一致的待遇，这就从制度上进一步赋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崇高的政治地位。

### （二）中央顾问委员会具有广泛的资政权能

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和履行职责，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赋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直接向中央提供咨询建议和处理相关重大问题的职责与权限，中央顾问委员会负有“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之职责，同时承担“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以及“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等重要工作。<sup>③</sup>基于这一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资政建言方面具备了独特的制度优势。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后，党中央在党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明确了中顾委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权限。1982年9月13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在出席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就中顾委的主要任务做了初步说明和安排。9月30日，中顾委工作小组颁布《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分九条划定了中顾委的主要工作内容。1983年，中央书记处进一步为中顾委划定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sup>④</sup>。结合以上三次对于中顾委的工作规定，中顾委的主要工作内容涉及七个方面：一是协助中央和地方党委发现、挑选和举荐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二是接受中央委托协助处理某些专项事务，包括调查处理党内历史遗留问题、协助调查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等；三是协助中央整顿党风党纪，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四是发挥老干部的崇高威望和政治影响力，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工作；五是开展党史研究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积极宣传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大方针政策；六是深入基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协助中央检查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并身体力行推进社会建设；七是协助中央安置离退休老干部，团结和服务好革命老同志。可以看出，中顾委的工作职权涵盖了治党治国各领域，具备了广泛而全面的资政职能。

在存续的十年期间，中顾委通过直接参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相关会议、组织中央委托部署的专题讨论以及中顾委内部设置的学习制度、请示汇报制度、报告会制度和调查研究制度等四项制度对治党治国问题进行学习讨论，并就形成的建议和意见以简报、信函、内部刊物《通讯》等形式向中央进行反馈。<sup>⑤</sup>通过上述方式和渠道，中央顾问委员会得以在深入工作的基础上为党中央提供大量基层情况和真知灼见。

### （三）中央顾问委员会具有明确的过渡性质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由党中央领导设置的一项典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一类区别于正式制度的具有试验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等特点的特殊制度形式<sup>⑥</sup>，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具有降低改革成本、增进改革共识和提高改革风险控制能力等制度优势。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存续的十年间，始终按照过渡要求开展工作，并在完成党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后按预定安排主动完成撤销。由于这种过渡性质，中央顾问委员会在推动稳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方面发挥出了显著的制度优势。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第20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4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1页。

④黎虹《回忆薄老在中顾委的十年》，《党史文汇》2008年第2期。

⑤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43页。

⑥周冰，黄卫华，商晨《论过渡性制度安排》，《南开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中央顾问委员会在设置之初就明确了过渡性质。1981年6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干部年轻化的时间作出估计：“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sup>①</sup> 这为中央酝酿中顾委的存续时间提供了基本依据。1982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过渡时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sup>②</sup> 同年9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它在成立的同时应该准备宣布解除的大致时间。邓小平强调，中顾委应争取在十年内撤销，“在两个五年内废除这个过渡形式……能够争取早一点取消更好。”<sup>③</sup> 在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撤销时间大体确定。此外，党章规定，顾问委员会制度只在中央和省一级设置，省以下一律不设置，且中央顾问委员会与省级顾问委员会之间在组织上没有隶属关系。这从组织结构层面对顾问委员会的规模进行了限制，进一步明确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过渡性质。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后，始终注意按照过渡要求谨慎而积极开展工作。邓小平强调，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组织，中顾委开展工作时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sup>④</sup> 因此，中顾委从设置的第一天起就时刻注意对新班子的工作“既要支持，又不要干预”，<sup>⑤</sup> 在党中央需要的时候“从旁提出建议”，<sup>⑥</sup> 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sup>⑦</sup> 以实际行动信任和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时刻为组织撤销和平稳过渡做准备。为了中顾委能够更超脱地开展工作，减小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中顾委的工作方针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sup>⑧</sup> 1986年4月，为了进一步规范中顾委的工作方式，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发表《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怎样工作》讲话，提出老同志工作“六要六不要”的基本原则，<sup>⑨</sup> 旨在降低中顾委对中央和地方工作消极影响的同时帮助更好发挥老干部的资政建言作用。

在党的十三大期间，中顾委不断调整活动安排，自觉主动推进撤销进程。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带头辞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与其他三十名中顾委委员一起退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为按时撤销中顾委做了表率。与之相适应，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订案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一条删去，选举主动退出中央领导工作的陈云同志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党的十三大闭幕后，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始主动降低自身活动频率。中顾委常委会作出规定，今后五年的工作，“除中央交待的专项调研任务外，中顾委本身不出题目、不组织专题调查”。<sup>⑩</sup> 上述安排为中顾委的最终撤销提供了坚强保证，使中顾委在积极发挥历史作用的同时干净利落地退出历史舞台，推动实现了新时期国家政治制度的顺利过渡。

### 三、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历史贡献

得益于独特的组织制度优势，在存续的十年间，中央顾问委员会在整顿党风、培养青年干部、推进制度改革、巩固党的领导和维护安定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①《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9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101页。

⑦《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2页。

⑧黎虹《邓小平、陈云与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⑨《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1页。

⑩李力安《回忆中顾委时期的薄一波》，《党的建设》2008年第3期。

### （一）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

帮助党中央选拔年轻干部，是中顾委建立后的一项明确任务和“重要责任”。<sup>①</sup>中顾委成立后，为新老交替合作提供了可靠的制度通道，同时以此为基础在组织上为党中央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有能力的中青年领导干部，推进了老中青有效衔接的干部梯队建设，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组织队伍新老交替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顾委存续的十年期间，先后四次累计吸纳了292名主动从工作一线“退下来”的中央领导同志，为中央党政机关年轻化创造了空间。在中顾委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委员会开始有步骤地加速推进干部结构年轻化和专业化进程。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相继有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其中55岁以下的干部比例达到了46.3%，提高19.5%，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央委员的比例则达到了73.3%。<sup>②</sup>由此，经过新老交替合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新时期顺利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队伍。

在年轻干部选拔方面，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完成了对省级领导班子的考察和调整。1982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省级领导班子配备的几点原则意见的通知》，决定正式启动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和新老交替工作。根据中央安排，中顾委委员赵毅敏、雍文涛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小组成员，共三百多位退出一线的老同志组成多支工作组分赴各省市自治区对干部选拔和领导班子调整进行帮助和指导。老干部工作超脱、政治眼光敏锐，经过广泛联系和充分交换意见，有力地协助各地解决了人事方面的困难。经过调整，1983年全国省级党委、正副省长55岁以下的比例从15%提高到了48%，平均年龄下降了7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领导干部占比达到了42%，其中新提拔的省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更是占到了71%。<sup>③</sup>省级领导班子兼职、副职情况大幅减少，有力实现了新老交替合作。党的十四大前夕，中顾委再次协助中央先后对中央部委和各地方省委领导班子的配备进行了全面考察，为党组织选人用人贡献了力量。

在干部培养方面，中央顾问委员充分发挥了老干部传帮带作用，帮助实现了年轻干部的高质量培养。陈云强调，老干部只有担负和完成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sup>④</sup>一方面，在具体工作中，中顾委同志经常向中青年干部传授丰富宝贵的治党治国经验和决策建议，帮助中青年干部快速成长。比如，1990年1月，陈云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向他们介绍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sup>⑤</sup>并在各种场合向一线领导干部反复阐释，起到了很好的经验传授作用。另一方面，中顾委委员始终坚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发挥好模范作用，使中青年干部能够传承老干部坚持斗争的革命风貌。在日常生活中，老同志们积极主动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战略部署，在历次支部会议中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刻注意查摆自身与中央要求的差距，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为全党端正党风和加强纪律做了表率。

### （二）推进了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将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作为新时期推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任务，中央顾问委员会在推进这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置推动了干部离退休制度的稳步建立。1982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

①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1月1日。

②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③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④《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

⑤《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

《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正式将顾问制度确定为老干部退居二线的一项制度安排。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后，172名中央老干部从领导一线退出进入中顾委，在十年期间累计增补115名老干部进入中顾委。1985年和1987年，67名老同志主动退出中顾委，实现完全退休，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了表率。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带动下，“全国几百万超龄的在职干部从工作岗位上陆续退下来”，<sup>①</sup>为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党中央于1988年和1992年相继发布《关于认真执行干部退（离）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干部退休工作的意见》，标志着干部退休制度系统建立，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得以根本废除。通过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形式有步骤地妥善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的伟大创举，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长期没有根本解决的难题。

中顾委帮助推动了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和体制机制的现代化改革。中顾委建立后，中央顾问委员会不少委员按中央要求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部门机构的精简工作，同时在政治、经济、科研、外贸、金融、教育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工作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许多身处一线的中顾委委员直接领导推动了所在领域的制度改革。比如，中顾委委员刘复之在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期间积极推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的改革和国家检察制度的改革，推动制定了《检察官法》。中顾委委员王芳在担任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期间全面推动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了人民警察警衔制度，推动制定了《人民警察法》，等等。

### （三）巩固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威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领导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中央顾问委员会积极开展整党工作，以身作则端正党风和维护党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用实际行动帮助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彻底解决“文革”十年对党组织造成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党中央决定开展“整党”。在整党起草酝酿阶段，中顾委连续召开了三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向整党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为整党决定的形成尽了一份力量”。<sup>②</sup>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正式启动整党。在选举产生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中，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担任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一职，会同其他39名中顾委委员担负起了协助中央整党的重责。整党正式开始后，中顾委明确将参加整党“列为今后工作安排的第一项”，<sup>③</sup>将所有中顾委委员按地理区划分编为东北和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和西北组四组，协助党中央全力参与各地整党工作。在三年多整党工作中，中顾委委员以老同志的经验和威信协助党中央全面清理“三种人”，纠正了党风党纪，为党组织清除了隐患，纯洁了党的肌体。

中央顾问委员会旗帜鲜明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1987年初，个别中央负责同志在反对错误思潮问题上态度不坚决，在1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列席会议的中顾委常委以老干部的赤诚和党性原则，对犯错误的同志及时进行了批评和帮助。面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中顾委旗帜鲜明支持中央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采取的正确决策部署，立场坚定地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月26日，陈云在主持中顾委第十一次常委会议中强调“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sup>④</sup>1989年9月8日，陈云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谈话，强调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了新动向，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转变为“文”“武”并用、“文”更突出的阶段，“搞所谓的‘和平演变’”。<sup>⑤</sup>继续就改善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向党中央提供意见建议。在存续的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②《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9页。

③《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21页。

⑤《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0页。

十年间，中顾委总是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注意防范意识形态领域的危险，矢志不渝维护党的领导和党中央权威，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权威。

#### （四）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顾委成立后，通过专题会议、调查研究等多种形式参与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工作，身体力行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委托下，中顾委多次以专题会议的形式对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进行讨论。除了整党、推进机构改革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专题外，中顾委还就农村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七五”计划、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等文件的出台组织了专题讨论<sup>①</sup>，为党中央决策的形成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中顾委通过驻点联系等方式深入农村、学校、工厂等基层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十年时间里形成了“四百多篇，不下二百万字”的高质量调查报告<sup>②</sup>，内容涵盖了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从经济改革、医药卫生事业、水利事业、教育事业到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充分发挥了中顾委资政建言的作用，向党中央提供了基层发展情况和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原中纪委书记李昌在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后于1987年前往湘西调研，写出《关于尽快改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贫穷落后状况的意见》，建议通过新建大学等教育和文化扶贫方式从根本上改善湘西的贫困状况，为湘西发展提出了恳切意见。1989年11月到12月，中顾委委员李力安走访陕西秦巴山区调查扶贫问题。22天时间里，李力安走访了4县6区50多户海拔在1000米以上地区的贫困户，形成了《关于陕南山区扶贫情况的调查报告》<sup>③</sup>，强调陕南扶贫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因地制宜等重要建议，等等，这些报告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实质贡献。

此外，围绕着上述工作，中央顾问委员会在日常工作中也时刻关心国家发展，对改革开放事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比如，1988年，针对物价改革、粮食安全等经济工作问题，中顾委主任陈云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了“八点意见”<sup>④</sup>，强调粮食与财政安全、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这八条意见被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党中央推进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 （五）有力维护了新时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维护团结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在存续的十年间，中顾委始终强调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sup>⑤</sup>，在维护党内团结和社会稳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凭借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帮助妥善处理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针对党内部分同志对西北革命历史统一看法问题的争论，中央决定成立由中顾委常委李维汉、中顾委委员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及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何载组成的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研究解决该问题。五人小组受命积极开展工作，在实事求是原则下与有关老同志充分交流意见，取得各方对该问题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最终妥善解决了这个争论，团结了一批老同志。围绕着宁都暴动统一认识问题，中央委托中顾委委员伍修权进行协调解决，同样凝聚了共识、增进了团结。此外，在中顾委历次组织生活会中，老同志对有争议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来正确对待和处理”<sup>⑥</sup>，取得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良好效果。

广大中顾委委员积极联系沟通群众，在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方面也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十年期间，老干部们通过撰写和发表回忆性文章、参加各种与党史、国史相关的纪念活动、回访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③李力安《党旗下八十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第307页。

④《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367页。

⑤《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4页。

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革命根据地等方式，积极向群众宣传了党的革命历史。与此同时，通过与青年进行座谈和访问基层社区群众等途径，中顾委委员主动深入群众了解各方面诉求和困难，耐心向群众宣传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政策主张。面对社会上的不实言论和错误思想，老干部身体力行通过教育沟通进行细心引导和纠正，帮助凝聚了群众的共识，有效增进了党群关系，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作出了贡献。

## 结 语

可以看到，作为过渡性组织，中央顾问委员会发挥出了全面而突出的重要历史作用。在其存在的十年时间里，中央顾问委员会不仅推动了干部新老交替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核心任务，更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团结了党内外干部群众，推动了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有力捍卫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了历史转折和新时期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作为“党从实际出发选择的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和“创举”，<sup>①</sup>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推进改革发展的集中展示和历史典范。正是在改革过程中坚持围绕解决实际问题的大胆创新，中央顾问委员会具备了独特的组织制度优势，为其做出突出历史贡献创造了根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据历史需要应运而生到完成历史任务后主动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创置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改革智慧。中顾委的经验表明，越是涉及系统性、全局性和影响深远的改革，越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一谋划，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以此形成改革的合力，发挥出改革的最大效能。总之，党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对今天以制度创新推进改革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Its Historic Contributions

ZHU Jiamei , YE Xinlu

**Abstract:**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wa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install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o solve problems like generation gap in the leadership , promoting reform in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 committee enjoyed high political prestige and and great capabilities in political consultation , though it was a transitional set – up. The committee played a vit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change – over of power from the elderly leaders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 promoting reform in the leadership structure of both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 consolidat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 pushing fo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 making uniqu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new period ,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 Leadership , System ,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责任编辑 张振伟)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93页。